

日本花祭民俗与中国傺蜡文化

余 达喜

日本花祭据传已有700多年的历史,是国家重要无形文化财产。日本国际常民文化研究机构,开展亚洲祭祀表演的比较研究,邀请了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的学者对日本爱知县奥三河地区的花祭进行考察。2009年12月13日(12月的第二个星期日),我们在东荣町中在家对当地的花祭表演进行了全程考察。

中在家的花祭祭场大约由神座、舞场、神屋、事务所四部分组成。神座是花祭的中心,供奉牌位和供品,花大夫等神职人员以及鼓师,笛师盘座其中,空中悬吊五色纸条做成的“天盖”。墙梁上贴满了白纸剪刻的日月图案和五方马图案。舞场的四周有五棵新砍的绿树枝插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上,中间垒起一泥灶,上面架有一口铁锅(汤立)。舞场的一侧是一间神屋,供舞者候场和存放道具、服饰。另一侧是受理神事关系登记奉纳的事务所和可供人观摩的“见物席”。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在祭场之外的前后2个空旷山地上,分别设有2个小的祭坛。祭坛很特别,由五根新竹顶部夹着红、黄、青、白、黑五色纸条,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插在地上,下面有五谷供品,可能是五方神灵降临的“天梯”。此外,在舞场的前端空旷地上设有一个火塘,里面大块的木柴燃烧不息,柴烟腾空,很象中国古代的柴燎祭天。

花祭的构成十分繁杂,大体上由迎神,诵经唤神,人和神的舞蹈,还神等环节组成。

花祭的仪式过程也十分冗长,单调。从早上8:00一直到晚上11:00左右才结束。24个艺能舞蹈穿插在神事过程中,有花之舞(三人扇舞,三人刀舞,四人剑舞);有鬼之舞(山见鬼舞、柗鬼舞、茂吉舞);还有一些类似“三番叟”的翁舞等。

关于花祭的含义,众说纷纭。我比较认同折口信夫先生的解释:花是稻穗的象征,是意味自然万物的生命之花(见野村伸一先生的资料)。从现场考察的许多民俗事项来看,花祭与中国的傺祭和蜡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。

蜡祭源于中国古代原始社会,是先民在农耕过程中,对谷物和农业神的崇拜。据《礼记·郊特牲》记载:“郊之祭也,大报本反始也。天子大蜡八。伊耆氏为蜡,蜡也者,索也;岁十二月,合聚万物而飨之也,蜡之祭也,主先啬而祭司啬也。祭百种。以报啬也。飨农,及邮表畷,禽兽,仁之至,义之尽也。古之君子,使之必报之。迎猫,为其食田鼠也;迎虎,为其食田豕也,迎而祭之也。祭坊与水庸,事也。曰:土反其宅,水归其壑,昆虫毋作,草木归其泽。”

蜡祭所祭之神都和农业有关。先啬是农业的首创神——神农氏。《易经·系辞》说“神农氏作,斫木为耜,揉木为耒,教民树艺五谷”。意思是说神农氏发明了耒耜农耕农具用来翻田耕种,收成五谷。五谷即: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五种食用粮食。猫、虎因食田鼠和田豕,保护农作物而受祭,坊和水庸(堤坊和水渠)因灌溉农田,蓄水泄洪也受祭之。总之大凡对农业丰收有功的,都仁之至,义之尽,使之必报。显然,蜡祭是报田祭、丰饶祭、感恩祭。

据悉,日本花祭主要散存于天龙川中游一带的山区。我们考察的中在家也是一个地处深山的村落。旧时中在家的自然条件肯定是昔不如今,野兽出没,山洪泛滥,水土流失,旱灾、水灾、虫蝗之灾都是农业的大害,有个好年成实为不易。从现场参于花祭的民众心理来看,

山民们感谢百神的恩赐，祈愿五谷丰收，防止疫病灾害，驱除污秽邪恶的民俗愿望还是很明显的。

花祭中有许多与中国五方观念很相似的民俗事项。红黄青白黑五色纸饰，代表东西南北中的五方新绿枝，以及身着红黄青白黑五色服饰、面具的榑鬼，还有每个舞蹈基本上都是跳五个方位等。可以说五方观念贯穿整个花祭仪式。

祭五方而求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祭祀做法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曰：“八蜡以记四方”。祓禳于四方是中国蜡祭的重要内容。在国际常民文化研究机构，我们观看了早川孝太郎早期拍摄的花祭映象，其中有许多五方观念的信息，如“四方旗四”，以及用白纸做的“八桥”，挂在四个方位。表示神从这里下凡等（见野村伸一资料）。

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四方与五行是对应的，四方中蕴涵了五方。就象四时一样，春夏秋冬匹配了“季夏”（夏季的第三个月即旧历六月），与五行对应，所谓“春为木，夏为火，季夏为土，秋为金，冬为水”。空间方位也是如此，东南西北匹配了中央，成为东方为木，南方为火，西方为金，北方为水，中央为土。五行、五色、五祀、五方、五帝、五神。在中国民间祭祀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而又充满神秘力量的巫术观念。中国傩戏中法师请神先要恭请东方青帝兵，南方赤帝兵，西方白帝兵，北方黑帝兵，中央黄帝兵，然后再参拜五方功曹，即东方青功曹，南方赤功曹，西方白功曹，北方黑功曹，中央黄功曹，尔后是驱逐五方瘟疫。由开山神挥舞钺斧五方砍杀：一砍东方甲乙木，二砍南方丙丁火，三砍西方庚辛金，四砍北方壬癸水，唯有中央不砍（中央戊己土）。

中在家花祭中的五色“天盖”可能是迎送天神的“幡盖”；五棵新绿枝可能是五方天神下凡的“天梯”；五色榑鬼跳五方可能是驱逐五方不祥；场外的祭坛里的供品可能是“五谷”；场中央的“汤立”可能是“五祀”中的祭灶（五祀即门、户、中霤、灶、行）。中国民间祭灶神很盛行，每年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祭灶仪式。

日本花祭的日期安排各地都不一样。大多数都集中在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2、3月。东荣町小林諏访神社为11月的第2个星期六，中在家为12月的第2个期日，古户为1月的2、3日，丰根村的布川为3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等等。其实，中国古代的蜡祭初始时也是祭无定日。《说文》说“冬至后三戌，腊祭百神”（腊，蜡相通，腊是蜡的转称）。原因是，冬至在我国的农历中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日子，有时会在年终的十二月，有时会落在来年的一月。大约到了南北朝时，才将十二月初八日定为腊日。这一点是否影响到了日本的花祭举行日有待于进一步研究。

酬神报赛为“蜡”，驱鬼除崇为“傩”，傩祭和蜡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融合，衍为民俗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载：“先腊一日，大傩，谓之逐疫”。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腊鼓鸣，春草生，村人并击细腰鼓，戴胡公头，及作金刚力士，以逐疫”。可见傩蜡在古代就相互渗透，相互融合。

傩是农耕文化的产物。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以水稻生产为主的稻作农业区。我曾作过一次调查，以北纬40度为界，越往南走，傩文化越是密集，而北纬40度以北，都是以“萨满”为主。一个是稻作文化，一个是游牧文化。我称之为“南傩北萨”。日本学者諏访春雄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论述“假面文化在赤道四周地区大量存在着，越往北方，假面文化就越少，因此，我认为假面文化与某种农耕或者旱田耕作相关”（諏访春雄《假面的分布》）。我曾从1996年开始，多次在广田律子教授的关照下，从日本北边的岩手县一直往南直到冲绳岛，考察了许

多的追傩行事。令我感兴趣的是，它们和中国的傩一样，与农业稻作文化关系十分密切。

日本也是一个很重视农业祭祀的国家，各地举行的追傩行事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火把的运用。大分县国东町六乡满山成佛寺举行《修正鬼会》，几十米高的巨大火把竖立寺庙旁，让人观为叹止，其驱鬼仪式也是由火把引领三位来访神走村窜户，沿门逐除。爱知县岗崎市龙山寺的《鬼祭》更是火把成群，声势浩大，形成强大的“火攻”阵势，围着寺庙彻夜追赶驱逐。还有京都庐山寺的《鬼法乐》，吉田神社的《节分》都是大量使用火把逐疫。很显然是受到中国傩文化的影响。火把是中国驱傩中的重要关目，据《续汉书·礼仪志》介绍：“先腊一日，大傩，谓之逐疫……持炬火，送疫出端门，门外驺骑传炬出宫，司马阙门外五营骑士，传火弃雒水中”。《东京赋》又载：“煌火驰而星流，逐赤疫于四裔”。可见火把是驱傩的强形成。中国南方江西省石邮村的搜傩仪式通宵达旦，火把始终贯穿整个仪式。该村有专门的组织“火把会”，负责每年从山林里砍下大量的山竹晒干，制作成2—4米的火把（旧时还有几亩专门供火把用的山林）。搜傩时负责传送火把，携照田塍沿门逐除时，火把引领开山神于每家每户目察区隅，戈击四隅，驱逐不祥。我问当地乡民为何要用这么多的火把，乡民除了告诉我是祖上传下来的以外，还告诉我“疫鬼怕火”。乡民说的疫鬼实质上就是影响谷物及人畜生长的“阴气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说：“季冬之月，命有司大傩，旁磔，出土牛，以送寒气”。在古人的思维中，万物都是有生命的，冬春交替之季，阴气若不及时驱除，来年定为祸害，必须借助阳精之火逐阴达阳，“送寒气”就是毆除阴气带来的不祥。云南少数民族的“火把节”跟稻作文化关系更为直接。据《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》介绍，在武定，禄劝彝族地区，火把节即可以火烧危害禾苗的害虫，又可以使谷穗看到火把，加快生长。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先生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：“火不单是征服邪鬼恶魔，而且是招来神灵，以便保护农作物，保证丰收的象征。举行火把节，既可以用火烧死为害禾苗的害虫，又可以使谷物的穗看到火把，而加快生长。”（伊藤清司《传说与社会习俗—火把节故事研究》）

在中在家的花祭中，我们多次看到几位女童持火把引领山见鬼，榊鬼等，围绕“汤立”目察区隅，司执遗鬼，很象中国古傩索室毆疫景象。此外，花祭舞场外一直燃烧的火塘，也是可以与火把互相参照的。一般意义上人们可能会理解为是深山里围观群众御寒取暖的篝火。其实它也是为强化火把逐疫功能的“柴燎”（或说庭燎）。“柴燎”即烧柴祭天，是中国古老的祭祀仪式，《尔雅》曰“祭天曰燔柴”。古人祭天用“烟祀”，燃烧时柴烟升上天空，人们希望腾空上升的柴烟能把人们的愿望传递给天神。同时又希望天神顺着柴烟降临人间。即是祈神，迎神，又是借巨大的阳精光焰逐阴达阳，驱邪逐疫。它和火把的功用在本质上是相通的。郑玄注“树于门外曰大烛，于门内曰庭燎”。

“汤立”也是日本花祭中的重要关目，其中隐藏着许多等待我们破译的文化密码。尽管各地“汤立”的形制各有不同，有的是用泥垒起来的，有的是用铁锅架起来的，但它在花祭中的突出位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。

中国民间有“祭灶”的风俗，传说先民由茹毛饮血到用火烧烤食物，发明了火食，由此创造了灶神。《事物原会》称“黄帝作灶，死为灶神。”《淮南子·汜论篇》：“炎帝作火而死为灶”。《周礼说》：“为祝融，祀以为灶神”。黄帝，火帝、祝融都是传说中的灶神火食对人类的生活关系实在太密切了。早期的灶神产生于人们对火的自然崇拜，逐步成为国家祀典的“五祀”之一。后来由掌管灶火和饮食，演变成监察人间善恶功过并报上帝的监察神。传说灶神是天帝派往各家的监察大员，专门负责监察每家每户的德行与功过，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神上天

专门向天帝禀报人家善恶,由于爱打小报告,说坏话。因此民间“与其媚于奥,宁媚于灶”(《论语》)。每年祭灶神都要用麦芽糖粘在灶神嘴上,让它在天帝面前多甜言蜜语,少恶言恶语,避免天帝惩罚。

如果我们将“汤立”和中国祭灶从民俗心理,象征意义以及功能和作用等角度加以比较,可能是个十分有趣的课题。在我看来,对“汤立”的研究,应该是多方位的取样描述。遗憾的是对花祭的考察仅仅是第一次,而且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,因此,还有待于今后与日本学者来共同讨论。

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花祭中有一件道具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,那就是四个青年舞者在泼水时使用稻草做成的扫帚。他们边舞边用扫帚向围观群众泼洒汤立锅中的圣水,祝福人们洁净吉祥。我们知道,驱邪与纳吉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,驱邪的目的是为了纳吉。《东京赋》在描写古代驱傩情景时,有这样的记载:“方相秉钺,巫覡操茆”。“钺”是斧钺兵器,以凶制凶,用于驱赶疫鬼,“茆”是扫帚,既可扫除不祥,又可洁净纳祥。扫帚除秽,由来已久。“帚”字最早可见于甲骨文,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,就有“子持帚作洒扫形”的铭文。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陈家梦先生认为:古人不但于清洁行为中附于巫术行为,认为洒扫以后可以有亡疾避灾的结果,并认为清洁行为也可以有与实际清洁行为同等的效力……傩乃是将清洁的对象从室到室隅到空气间到四方。殴鬼疫的巫术其本初乃是清洁行为(陈梦家:《商代的巫术与神话》)。

宋代有一幅《大傩图》据孙景琛先生考证“画面上十二个戴着不同面具的人物,拿着家常用具如扫帚、扇子、斗土簸等作为舞具”。说明宋代驱傩就有了扫帚,其功能和作用可以和今天的驱傩对应。贵州威宁彝族《撮泰吉》,每年要举行“扫寨”仪式,要扫除的是灾害和瘟疫,其咒辞:

威荣该留着,
威荣不要扫。
福禄更昌盛,
福禄也不扫。
口嘴口舌扫,
牛瘟马瘟扫,
猪瘟狗瘟扫,
鸡瘟牛瘟扫。
灾害与瘟病,
走喽!走喽!

再看贵州地戏《扫开场》诗文,全是吉利之语:

扫开场,扫开场,
扫个红日照四方,
扫个大场卖牛马,
扫个小场卖猪羊,
扫个文场卖笔墨,
扫个武场卖刀枪。

……

而《扫收场》诗文全是驱邪纳吉的内容：

木精木怪扫出去，
金银财宝扫进门，
火精火怪扫出去，
牛马成群扫进来，
金精金怪扫出去，
五谷丰登扫进门，
水精水怪扫出去，
万股银水滴进门，
天瘟扫在天堂地，
地瘟扫在地少卜，
各种疾病扫出去，
一鞭打出九霄云。

扫帚除秽纳吉的功用，发展到现今又成为中国传统的“扫年”习俗。每年腊月二十四日人们都要忙于打扫房子，清洁房室，把一切“晦气”、“污秽之气”统统扫出门。因为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，又有“除陈布新”、“除旧迎新”的说法。

花祭从取圣洁之水精进洁斋，到最后用扫帚泼水为民除秽纳吉。尽管遮蔽在背后的扫帚作用不容易被人关注，但我们可以从用扫帚泼洒圣水的象征意义与中国雉蜡驱邪纳吉，求吉祥的心理作用中看到它们是相一致的。多多少少含有雉蜡的遗绪。

花祭的民俗功能是驱疫除秽，净化洁斋，形式特点是神事和艺能，结构特点是诗、乐、舞为一体。它和中国的雉蜡文化非常相似。但是要将花祭与中国的雉蜡文化进行比较，困难比较大。首先是缺少资料以及对花祭学术史的了解（这方面日术的研究者已经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）。其次是对花祭的了解实在是太少（仅此一次的考察）。因此，也只能作为第一次考察零碎的观后感，和一些表象的描述，也难免有些偏颇和谬误。本文只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为大家提供一些基础性资料，共同来完成共通性的研究成果。